

· 民族文献学与研究 ·

民族学家与西南民族文献的发现

苍 铭

历史上，由于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歧视，西南各民族的文献只能在民间传播，官方没有做过系统的调查和整理，许多文献也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人们并不太了解西南各族中有多少种文献。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自 20 世纪初民族学传入中国后，中国民族学家开始深入边疆进行田野调查，调查中常常意外地发现一些文献，使许多民族和他们的文化逐渐为海内外人士所认识，重视民族文献的记录，也成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一大特色。

杨成志与彝族、瑶族文献。杨成志先生是中国民族学界的元老之一，也是最早注意搜集和研究民族文献的民族学家。1928 年，受中山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派遣，他随俄国学者史禄国夫妇前往云南调查少数民族情况。史禄国夫妇到昆明之后，感到当地社会治安混乱，安全无保障，在作了一些简单的调查之后即于当年 10 月返回广州。杨成志先生却不畏艰险，只身进入四川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进行调查。在那里，他向彝族毕摩学习彝文，搜集了大量的彝文经书。1930 年回到广州之后，他首先在《国立中山大学

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十一集上发表了《罗罗文字的起源及其内容一般》一文，初步介绍了自己在彝族地区学习彝文和搜集彝文经书的情况。以后，他又根据此次调查的材料，发表了《罗罗太上清静消灾经对译（罗罗文——汉文）》、《罗罗的文献发现》、《罗罗的巫师及其经典》、《罗罗的语言文字与经典》、《罗罗文明源流探讨》、《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等一系列的文章和著作。此次调查的收获，也使得他从此走上了民族学研究的道路。1936年，丁文江在他的《彝文丛刻》自序中，将杨成志列为研究彝文的第一位中国学者。1946年，民族学家黄文山在《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一文中也说：“国内研究罗罗专家以杨氏为巨子。”^①《新纂云南通志·方言考》卷十七记载：“粤人杨成志衔中山大学使命，曾只身入大凉山请罗罗祭师所谓毕摩者以罗罗语言，授以罗罗经典，半年间竟能了解其俗习礼制，乃从中西文互译其经咒、歌谣130部……。”也正是此次彝族文献调查的成功，促成了中山大学将他派往法国学习民族学。1933年，杨成志获得了巴黎大学民族学博士学位。1934年，在第一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会议上，他以研究彝族文献而写成的《罗罗文字与经典》一文在大会上宣读。这篇论文还被译成英文，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主办的《人类》杂志上所刊载。1935年，日内瓦《东方与西方》杂志亦刊载了此文。此外，杨成志还以在大小凉山所获资料写成《罗罗族起源及其性格》一文，刊登在德国《种族学志》杂志。随后又写成《被遗忘的罗罗文明》一文，1936年发表于维也纳《人类志》杂志上。回国后，杨成志任教于中山大学，为中国民族学培养了一批研究人才。在他的学生中，有著名的民族学家江应樑、梁钊韬等教授。

除此之外，杨成志先生在瑶族文献的发现与搜集上也有突出的贡献。1936年，在桂北的龙胜县和平地区白水源头村从事瑶族的民族学调查中，他首次搜集到一份瑶族珍藏而不轻易给外人知道的《过山榜》（评皇卷牒），突破了瑶族券牒不给外人观看的禁

例。该《过山榜》是道光年间的抄本，是国内已知最古老的《过山榜》抄件，现藏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内。

岑家梧与水书、布依经书。岑家梧先生是海南澄迈县人，1931年考入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在大学期间，他和同学王兴瑞合著了12万字的《琼崖岛民俗志及其他》一书。1934年，大学三年级时，他在堂兄的资助下前往日本东京大学和帝国大学学习人类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1938年，他接受中英庚款资助，开始对西南民族的社会进行调查研究。1942年，他受聘到当时从上海搬到贵阳的大夏大学社会学系，接替吴泽霖先生主持社会研究部的工作。1943年9月，岑先生在荔波县水族农村搜集到水族文献45种，并请水族巫师韦元臣讲解。之后，岑先生写出了《水书与水家来源》^②一文。这篇文章介绍了水书的种类和用途、水书的具体内容、水书的结构、水书的来源传说，并通过水书的研究探讨了水族的来源。该文1948年发表于《社会科学论丛》新一卷，后被世人认为是开创了水族文献研究的先河。文章的发表，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水族的关注，水族人民也因此难忘岑先生的贡献。1981年，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民族调查组编写《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时，在序中写道：“著名社会学家岑家梧教授抗日初期在贵州对水族作过实地调查后，发表了《水书与水家来源》等论著，使世人知道在中国境内还有这么一个水族存在，并使世人知道水族还有他自己，只属于他而为其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本身特点，特殊性……。”^③也是在1943年9月的考察中，岑家梧先生在荔波县驾欧乡拉欧村遇上了布依族民间举行的“作桥”（还愿）仪式。他参与观察了这个仪式的全过程，搜集研究了仪式中所用的经书，写成了《仲家作桥的道场与经典》^④，并将这些文献进行了分类。著名民族学家凌纯声先生30年代在贵州的民族调查中也发现了几本水族文献，1940年，李方桂教授曾借阅拍照，以后日本语言学家西田龙根据照片上的水书文字材料写成了《水文字历的释译》一文。^⑤

陶云逵、吴泽霖与纳西族文献。陶云逵早年就读于南开大学，1927年赴德国柏林大学、汉堡大学研读人类学、遗传学、民族学，获博士学位。他是较早从事纳西族研究的中国民族学家，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正是陶云逵开创性的调查与研究，使国内其他学科的学者关注到东巴文化。1934年10月，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委派，凌纯声、陶云逵、赵至诚等人前往云南作民族调查。到云南后，他们一行分成了两个小组，其中陶云逵这一组从滇东南一路西行北上，次年10月，到达了东巴文化的发祥地——中甸白地。陶云逵在传说中的东巴始祖东巴什罗修行处发现了摩崖诗一首，还拍下了照片。陶云逵的发现，为后人研究东巴文字、文献的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此次调查中，他发现了1085种东巴经书^⑥。在此基础上，陶云逵写成了《关于么些之名称、分布与迁徙》^⑦和《么些之羊骨卜及肥卜》两篇影响较大的民族学论文。稍后，著名民族学家吴泽霖先生也到纳西族地区从事民族调查，他发现的东巴文献有600余册之多^⑧。

建国前，在西南地区从事民族调查研究的学者，多是今天民族学界称为“南派”的学者。他们的学术风格是注重材料的搜集和解释，相对轻理论归纳和总结。当然，对文献的重视也不仅仅是上述几位学者。在西南地区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学者们，或多或少地对民族文献的宣传和介绍都做出了贡献。在他们看来，文献材料可以帮助理解文化的起源及文化差异的原因等。不少学者在调查中，尤其是他们在调查研究少数民族宗教的过程中，对民族宗教文献进行了梳理和研究，这些学者在调查中不仅重视文献和现状，而且还留心文字的研究。江应樑在1944年写成的《西南边区的特种文字》^⑨，则可以看出40年代的中国民族学家对西南地区的民族文字已有了基本的认识。

以燕京大学为代表的“北派”民族学家，一般认为他们讲理论重应用，以横向比较、共时性研究为主要特点。尽管如此，在

田野调查中，他们也是非常重视民族文献研究的。林耀华先生1943年夏天率燕京大学边区考察团到大小凉山考察时就搜集了彝族的文献。此次考察是林先生从国外回来后，深入实地调查研究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林先生在其《大小凉山考察记》^⑨中记述说：“我们对于夷人的语言文字，也曾考察翻译，夷人文字很简单，夷族中能认识及应用者，不过百分之十，夷人笔摩专事……。”费孝通先生虽不研究民族文字，但他对白族古代文献的发掘却有较大贡献。1956年，费先生在云南从事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在大理凤仪县白汤天法藏寺大殿内，发现了两大橱古代佛经，其中就有南诏、大理时写本20多卷及一批宋元时期的写本、刻本。这些经卷中有许多是用“白文”批注的，读时须用白语才能理解其中的意思。这一发现对研究南诏、大理时期的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

一些研究历史、语言或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们，在他们的学术生涯中，对西南民族的历史文化作过调查，并有着重要的发现和独到的研究，有的人甚至从此改行从事民族学，对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基于此，学术界认为他们也是民族学家。

方国瑜与纳西族、傣族文献。方国瑜先生是西南民族文献搜集与整理成就最为杰出的学者。方先生是云南丽江的纳西族人，192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1929年转为本科，1932年大学毕业。在大学三年级时，他又同时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学习，1933年毕业。1932年夏天，在即将大学毕业前，北京大学研究所刘半农先生拿了一本法国人巴克所著的《纳西研究》给他看，并建议他研究纳西族文献。1933年秋，方国瑜先生回到丽江开始调查。当时他请东巴给他讲解东巴教的传说、教义和各种道场仪式，并编

写出东巴经书的目录。1935年，方先生将其调查所得整理成《么些字汇》初稿，但该书直到1980年才得以出版，重新定名为《纳西象形文字谱》^①。方国瑜先生是西南地区从事民族学调查研究较早的学者之一。1935年8月，由李根源先生介绍，他参加了中英会勘滇、缅边界南段未定界的工作，考察了滇西南地区的傣族、拉祜族、佤族。在这次考察中，方国瑜先生访问了孟定罕氏土司（1935年冬），时土舍罕定国将家藏的《猛卯思家官》一书（傣文）出示给方先生看，并逐句口译。方先生遂记录成汉文，定名为《麓川思氏谱牒》，从而使这份重要的傣文文献得以传世。1953年10月，方先生又对这份谱牒做了“笺证”^②。麓川政权是明代傣族在中国西南及邻近缅甸一带建立的强大的地方政权，明王朝曾发动了规模较大的“三征麓川”战争。思氏谱牒的发现，对于麓川社会历史的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根据1935年至1936年的边疆民族调查见闻，方国瑜先生还写成了《滇西边区考察记》、《旅边杂著》和《界务交涉纪要》等著作^③。这些著作被认为是30年代西南民族学田野调查的重要著作。抗战期间，方国瑜先生邀请凌纯声、向达、楚图南、闻宥等人编辑出版了《西南边疆》杂志，同时他又任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方国瑜先生专心致力于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的研究。他细心梳理和考订了云南地方的文献，撰写出版了《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④、《云南史料概说》^⑤、《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⑥、《云南史料丛刊》^⑦等文献研究著作，为云南民族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做出了重要贡献。

丁文江与《爨文丛刻》。丁文江先生和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是同时代的留洋地质专家。然而，让丁文江先生留名千古的则是在民族学、民族文献方面的贡献。早在1914年，丁文江在云南和四川会理等地进行地质调查时，他就开始在当地进行体质人类学测量，并且在当时一本名为《独立》的杂志上先后发表了《云

南的土著人种》、《四川会理的土著人种》等文章。他的研究在我国民族学发展史上留下了重要的迹印。他还到过贵州黄果树，与当地的布依族、苗族有过接触和了解。1928年，丁文江先生曾就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所发表的一些文章进行批评，他说：“大抵出于编译，错误极多，例如贵州之仲家实与僮人言语相同，与苗无关……。”^⑩不过，真正让丁文江先生出名的则是他编印的彝文经典《彝文丛刻》。关于《彝文丛刻》的搜集和整理，他在本书的自序中说：“民国十九年冬天，我从四川到了贵州的大定，因为得到了赵亚曾先生在云南被害的消息，没有心绪再做地质的工作。同时又因为约好了黄汲清先生在大定会齐，不能不在那里等他。同行的曾士英先生看见我闲居无事哀悼懊丧，极力劝我想法子消遣。于是我才再着手研究傣罗。一面测量他们的体格，一面搜集他们的书籍。第一部搜集到的是玄通大书，是内地会教士斯密特（Smiat）小姐替我用八元钱买来的。内地会里有一位傣罗师傅，能读经典，可惜不通汉文，不能翻译。其后有人介绍一位罗文笔先生，他已七十岁，少年时曾经应过县考。他自己说原来是白夷家（白傣罗）本不懂傣罗文，五十岁以后信了耶稣教（先在内地会，此后转入安息会），想用傣罗文翻译圣经，才发愤学起来。他带来了一本《帝王世纪》来给我看，我听他逐字讲解，才知道大部分是水西安家的历史。大定原是水西土司的地方——所谓水西是指乌江之西，是明朝最有权力的土司，最后为吴三桂所灭。书从宇宙开辟讲起，到吴三桂攻灭水西为止。罗文笔先生懂得注音字母，我于是给他约定，请他把所藏的七部书全数翻译出来。翻译的方法是先抄傣罗文为第一行，再用注音字母标音为第二行，然后用汉文逐字对照直译为第三行，最后一行乃用汉文意译。他照我的方法，费了三年的工夫才把七部书译完，陆续邮寄给我，这就是本书里面的《说文》（又名宇宙源流），《帝王世纪》（又名人类历史），《献酒经》、《解冤经》上卷，《解冤经》下卷，《天路指

明》和《权神经》七种。《玄通大书》的译名也是罗文笔先生定的，但是他说没有经过师傅，不能译全书。因为要保存傣文真相，只好用罗文笔先生的墨迹石印。又因为《玄通大书》原来尺寸很大，不能再十分缩小，所以其他各书不能不以它为准，每页印上下两页，卷册未免太大一点。”

《爨文丛刻》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编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十一，是当时国内首次翻译印行的彝文古籍。丁文江先生最卓越的贡献在于他开创了四行对译翻译民族古籍的科学方法，至今仍被民族古籍整理部门所沿用；其次，他为彝族文献、彝族文化的保存做出了贡献。彝族学者余宏模撰文说：“丁文江先生这样一位科学家，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当时彝族、彝族语言和彝文古籍还是处在受歧视的黑暗时代，虽说事出偶然，但他能不畏艰险毅然深入彝区，并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敏锐地看到抢救濒临绝境的彝文古籍的重要，积极收集整理彝文经典，为保存彝族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卓越见识和筚路蓝缕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令人敬佩。”^⑩

任乃强与《格萨尔传》。任乃强先生是我国近代藏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在国内，他第一个发掘整理了藏族史诗《格萨尔传》，并将其介绍给学术界。任先生1915年考入北京农业专科学校本科（今北京农业大学），1920年毕业后回到四川。虽然任先生是学农业的，但他的兴趣和志向却是历史和地理。1929年应胡子昂先生之邀，他首次考察西康地区，用一年的时间走遍了康定、丹巴、甘孜等十一个县，搜集了大量的藏区资料，先后写成了《西康诡异录》、《西康十一县考察报告》等文。此次考察使任先生从此与藏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在这次考察中，他还冲破了藏汉民族的隔阂和语言障碍，不顾世俗的反对，与藏族女子罗哲情措结为伴侣。在妻子的帮助下，从1932年起，他陆续撰写成《西康图经》三卷，约一百余万字。此书发表后，在国内引起广泛重视，推

动了全国的藏学研究，被誉为“开康藏研究之先河。”^②1936年西康建省后，他被推荐为建省委员，再次入康。这一时期，他学会了藏语、藏文，撰成《康藏史地大纲》一书，校注了藏文史籍《西藏政教史鉴》等书。对当地藏族、彝族、汉族的调查，写成了长篇报告《泸定导游》。1943年他还绘成了百万分之一的康藏标准全图和西康各县分图，填补了康藏研究中的空白，成为解放军入藏用图的蓝本。

《格萨尔传》是藏族民间广为流传的一部诗歌体历史小说，又称“藏三国”，即藏族的《三国演义》。这部书在藏族中的影响，犹如《三国演义》在汉族地区的影响一样，但内容与《三国演义》毫无关系。1928年，任先生入藏时得知这部书的影响力后，渴望知道其具体内容，但因不识藏语、藏文而未能如愿，仅看到了该书故事的壁画。1944年，时任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研究员的任乃强先生在入康藏地区考察时，搜寻到了此书，并作了深入的研究，1944年在《边政公论》第4卷4、5、6合期上发表了名为《“藏三国”的初步介绍》一文，该文考证了《格萨尔传》的版本、卷册数量、格萨尔的人物原型；介绍了《格萨尔传》在藏族民间的流传和影响，《格萨尔传》的引人入胜点；并对《格萨尔传》和《三国演义》进行了比较。1945年，热心于康藏研究的陈宗强先生选译了法国贞女大卫·尼尔1936年的英译本《格萨尔传》，任先生看到陈宗强的手稿后，非常高兴。为了让世人更全面地知道本书的详细内容，他极力鼓动《康导月刊》予以分期连载，并且，他还为此写下了引介文章《关于“藏三国”》^③。

任乃强先生自云他的学术历程是“由经济地理而沿革地理，转而跻于历史地理学之研究，民族研究亦因此始……。60年来，所有论著，莫不围绕康藏民族问题。然半途出家，于民族学基本知识初无所习，固不敢自诩为民族学者也。”^④但任先生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及在藏学方面的成就，说明他是一个地道的民族学家。

三

民族学家们对西南民族文献的调查研究与发现，推动了西南地区的民族古籍整理。1984年，中国政府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有组织、有计划的民族古籍文献抢救、整理工作。时至今日，西南地区的民族文献种类已基本明朗，它们主要由五部分组成：一是民族文字文献（彝、纳西、傣、水、傈僳、藏6个民族）；二是类汉字民族文献，即“字喃”文献（白、布依、瑶、壮、侗为代表）；三是民族口碑（各民族都有）；四是金石图录（大多数民族有）；五是汉文民族文献（汉文中有关少数民族的记载）。这之中前三类可以说是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古籍文献。但关于各类民族文献的具体卷册数量，大多数仍然不清楚，还需要进一步探究。

民族学田野调查中的文献发现多带有传奇色彩，但往往是民族学家们在付出艰辛劳动之后才有的收获。许多民族学家常在饥寒交迫中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如上述岑家梧先生，他的一些力作就是在奔走于昆明、贵阳、重庆的学术生涯中写成的，贫困流离的生活，甚至夺去了他两个女儿的生命，但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岑先生仍痴迷于他的学术事业；民族学界当时的才子陶云逵先生则因著述之劳累，更因为贫病的困扰而早早离开了人世。查寻前辈民族学学人的田野调查研究经历，他们的执着、勇气、学术造诣让后人无不折服。而且，那个时代的学人们多具备有外文、语言学、民族语、民族学理论方法、体质测量技术等方面良好的专业技能，同时还精通中国历史及文献资料，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这些学术修养和底蕴，是今天的民族学学人也需具备的。

今天，西方民族学理论已广为传播，民族学学术气氛十分活跃，理论方法的探讨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但是，传统的田野调查与文献结合的方法，仍不失为认识和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方法之一。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的民族志材料仍然是不全的，

尤其是现代社会文化急剧变迁之时，需要更多训练有素、掌握科学调查方法的人深入田野调查。

注：

- ①载中山文化教育馆编：《民族学研究集刊》第1辑，第1—26页。
- ②③《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2年12月。
- ④载《风物志》月刊，1944年第1期。
- ⑤陶云逵：《么些族之羊骨卜及肥卜》，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人类学集刊》卷1第1期，1938年。
- ⑥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第1分册，1936年。
- ⑦载《言语》，1980年8月。
- ⑧吴泽霖：《么些人之社会组织与宗教信仰》（下），载《边政公论》第7、8期合刊。
- ⑨载《边政公论》第6卷第1期。
- ⑩载《边政公论》第3卷第5、6期合刊，1944年。
- ⑪方福祺：《方国瑜与纳西象形文字研究》，载《云南文化资源研究与发展》，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11月。
- ⑫载云南民族研究所编：《民族学报》，1981年第1期。
- ⑬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印，1943年。
- ⑭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
- ⑮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1月。
- ⑯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10月。
- ⑰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云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2月。
- ⑱辛树帜：《编者的话》，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瑶山调查专号”第4集，1928年。
- ⑲余宏模：《爨文丛刻》与《增订爨文丛刊》，载《彝语文集》，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2月。
- ⑳㉔《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6月。
- ㉑《康导月刊》第6卷9、10期。

作者工作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98级博士生